

中国近代早期博物馆史研究三题

Three Problems about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Museum in Early Modern China

李 飞

Li Fei

(深圳博物馆, 深圳, 518026)

(Shenzhen Museum, Shenzhen, 518026)

内容提要: 自20世纪30年代系统展开中国博物馆史研究以来, 关于中国早期博物馆史仍有若干问题尚未解决, 如魏源《海国图志》中的“博物院”、林鍼《西海纪游草》中的“博古院”等, 尚有丰富历史面相有待揭示, 而唯有在相应语境下解读史料, 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本真。

关键词: 博物馆史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 《海国图志》 《西海纪游草》 博古院

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the history of China museums initiated in 1930s, but till today, some problems about this subject in early modern China remain unsolved, such as the meanings of bowuyuan (博物院) in Wei yuan's *Haiguotuzhi*, boguyuan (博古院) in Lin Zhen's *Xihaijiyoucao*, etc.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should be interpreted in appropriate context, otherwise may lead to be misunderstood.

Key Words: History of China museums; *Meilige heshengguo zhiliue*; *Haiguotuzhi*; *Xihaijiyoucao*; boguyuan

关于中国博物馆史之系统研究, 20世纪30年代肇端于陈端志、费畊雨等, 后尤以1945年傅振伦《中国博物馆史略》^[1]一文叙述最为系统周密, 由此奠定今日中国博物馆史叙述框架, 影响深远。时至今日, 虽有学者提出应当超越此种“二元一脉”的叙述典范, 强调“博物馆史不是缀合博物馆事件编年的自然产物”^[2], 但叙述典范的超越亦当建立在具体实证研究之上, 否则难免有沙滩造塔之虞。如果将“博物馆”观念与机构视作近代中国社会文

化转型过程中的一环, 那么通过对近代中国人“博物馆”观念和实践的探讨, 亦能由此切入近代思想史、社会史、教育史、制度史等领域, 使得“博物馆史”不再仅为“博物馆学”的博物馆史, 而能跻身于“近代史”范畴, 从而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由此获得的新知识与新理解, 亦能为当下中国博物馆事业提供某些借鉴。本文拟就中国近代早期博物馆史中尚未被前人解决的几个问题展开探讨, 希冀加深对近代博物馆的理解。

一、聚人与聚物：魏源和新博物馆学

1838年，美国首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又名高理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刊行《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一书，旨在向华人介绍美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状。在此书“边西耳文”（宾夕法尼亚）条下，作者写道该省“省城在省东底拉华湾、底拉华河之邻处，名曰费拉地费（即Philadelphia，今译费城）……省城内有一博物院，广聚天下出类拔萃之物”^[1]，此处的“博物院”或为汉语“博物院”一词的最早出处，具体所指当为美国1828年开幕的费城自然科学学会附属的博物馆（Museum of Academy of Natural Sciences of Philadelphia）^[4]，因博物馆从属于自然史的研究性质，故须“广聚天下出类拔萃之物”。其后魏源根据《四洲志》《职方外纪》《坤輿图说》等资料编纂《海国图志》，考虑到《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由美国人所写，“惟《美理哥志》出其本国，实校原志尤提纲领，故先之”^[5]，在描述美国方面，视此书重要性在《四洲志》之上，并大段征引。不过有意思的是魏源在引用此书时并未保留文献原貌，而是进行了一番删改调整，不过正是这些删改调整为研究魏源思想观念提供了重要参考。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把《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的“新韩塞省”（New Hampshire State，今译新罕布什尔州）改为“新韩塞部”^[6]、“华满创省”（Vermont State，今译佛蒙特州）改为“华满创部”^[7]，似乎有意将《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的“省”都改作“部”，或不无贬低之意。而前述“省城内有一博物院，广聚天下出类拔萃之物”一句，在魏源笔下，便被改作“省城内有一博物院，广聚天下出类拔萃之人”^[8]。从“聚物”到“聚人”，或能反映出以魏源为代表的传统士人对“博物院”此一机构的早期朴素认识。

“整个19世纪，美国的自然历史研究以及展示哲学研究的博物馆都与美国的国家野心紧密相关”^[9]。自然史研究必然要以动物、植物、矿物等具体的“物”为核心，故而19世纪早期作为美国博物

馆典型的费城自然科学学会博物馆，便是一个“广聚天下出类拔萃之物”的场所。对博物馆收藏的动植物和矿物标本进行整理、分类和研究，便构成了当时的知识前沿——“自然史”研究。这也是欧洲学问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在同时期的中国，作为士人学问大宗的经学，无论是乾嘉考据、理学，或初露苗头的今文经学，俱是以“文献”作为直接研究对象。金石学虽关注古代碑碣、钟鼎古刻等实物，但最终落脚点依然是“金石文字”。金石器物作为文字的载体，仅被视作传世文献的补充。而在知识传承方式上，传统中国的学问观更和当时强调分类分科、追求专业性的西方观念迥异，如钱穆言“中国传统，每认为学属于人，而非人属于学。故人之为学，必能以人为主而学为从。当以人为学之中心，而不以学为人之中心……故学问所尚，在能完成人人之德性，而不尚为学术分类，使人人获有其部分之智识”^[10]。按照今天的观念，中国传统学问多分布在人文社科领域，具有较强的人本主义倾向，故而“人为学之中心”。傅斯年描述得更为精到，“中国学术，以学为单位者至少，以人为单位者转多，前者谓之科学，后者谓之家学。家学者，所以学人，非所以学学也。历来号称学派者，无虑数百：其名其实，皆以人为基本，绝少以学科之分别，而分宗派者。纵有以学科不同，而立宗派，犹是以人为本，以学隶之，未尝以学为本，以人隶之”^[11]，所以本着以“人”为单位的“家学”观念的魏源，遭遇以“学”（物）为核心的“科学”与“博物院”，自然难以把握当时的西方学问特征，而仅能从传统出发予以理解，将“博物院”的主体由“物”改为“人”。刘梦溪指出“以人为单位还是以学为单位，是传统学术和现代学术的一个分界点，由前者过渡到后者是一个长期蜕分蜕变的过程”^[12]。有趣的是“物”和“人”的分野，也恰是博物馆学领域内争论不休的问题。如新博物馆学批评传统博物馆只注重“物”而未能关注到“人”，近来国内博物馆学界也就博物馆中“人”和“物”的关系讨论颇热。其实“聚物”抑或“聚人”，本质上还是知识论（学问观）的变迁和对博物馆社会

角色的定位不同。如在魏源眼中以“人”为本的中国传统学术，遭遇以“物”为基础的现代西方物质文明，最终便不得不进行调整改革，由此开启了一场持续近百年的中国知识转型过程。而《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与《海国图志》中的“博物院”，正是此一宏大历史进程开端的参与者。

二、林鍼的“博古院”之旅

1847年受雇于美国商人赴美充当翻译的福建人林鍼，被认为是“目前所知最早有博物馆经验的中国人”^[13]。他在所著《西海纪游草》中提到“博古院明灯幻影，彩焕云霄”，并解释说“有一院集天下珍奇，任人游玩，楼上悬灯，运用机括，变换可观”^[14]。这里的“博古院”，杨国桢1980年提出就是“博物院”^[15]。其后虽有众多学者沿袭此种说法，却一直未能确认林鍼所云的“博古院”究是何物。有人猜测林鍼参观的应是当时美国的自然史博物馆，认为他“在美国看到的应该有大量自然科学方面的展品，如大量的动植物标本、化石、地质样本等，这些对于一个未接受过科学教育、儒家教育程度亦不高的人来说，是难以理解和记述的，无怪乎他没有提及”^[16]，如若考明美国早期博物馆史，便会发现此种推测与现实可能恰恰相反，林鍼笔下的“博古院”，正是当时纽约由娱乐界大亨菲尼亚斯·泰勒·巴纳姆（Phineas Taylor Barnum）开办、以休闲娱乐为主要特色的巴纳姆美国博物馆（Barnum's American Museum）。

根据林鍼记述，他到达之处“地名纽约克，为花旗之大马头”^[17]。纽约最早的博物馆是1791年由塔慕尼协会（Tammany Society）开办的约翰·潘塔尔·塔慕尼美国博物馆（John Pintard's Tammany American Museum），1798年即宣告关闭。1810年，约翰·斯卡德（John Scudder）在纽约百老汇（Broadway）开办了新美国博物馆（New American Museum），收藏动物标本、古物和外国工艺品等，规模庞大，无与伦比^[18]，只是1821年约翰·斯卡德去世后，他的博物馆便开始走下坡路，1825年

还从中分出了斯卡德纽约展览会（Scudder's New York Spectaculum），同年10月26日，博物馆世家费城皮尔家族（Charles Willson Peale）的鲁安·皮尔（Ruben Peale）也在纽约开办皮尔纽约博物馆（Peale's New York Museum），自此纽约博物馆鼎足而三^[19]。及至1840年左右，斯卡德纽约展览会早已消失，剩下的两家博物馆也日渐没落。1841年12月，斯卡德的新美国博物馆因财务难以为继，遂被巴纳姆收购，1842年秋，皮尔纽约博物馆亦被巴纳姆收购^[20]，由此开启了纽约城中巴纳姆博物馆一家独大的局面。巴纳姆将斯卡德的美国博物馆更名为巴纳姆美国博物馆，并把后来收购的博物馆藏品都转移到此地，苦心经营，成为纽约城中一大景观，直到1868年一场大火，终结了这个机构。所以1847年到访纽约的林鍼，见到的“博古院”也只能是巴纳姆美国博物馆。

美国博物馆位于纽约百老汇和安街（Ann Street）的转角处，据巴纳姆回忆，他1841年接手之时，馆内无论藏品种类、数量或展厅面积都不大。巴纳姆一面增加展品数量，一面扩大面积，改善馆内结构，使得博物馆迅速成为纽约最为美丽、著名和舒适的娱乐场所。博物馆白天展览珍奇古玩和一些动植物标本，晚上进行各种各样的娱乐表演，节假日都有演出，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娱乐。为吸引眼球，获取更大收益，博物馆引入各类娱乐表演，如跳蚤表演、狗戏、杂耍、自动机器、腹语术、真人塑像、活人场景、巨人、侏儒、脱衣舞、哑剧和乐队歌舞表演，还有都柏林、巴黎、耶路撒冷等地的全景模型，各类新式机械装置和美洲印第安人的民俗表演，甚至还有一个机械引水的尼亚加拉实景大瀑布^[21]，而自然史标本陈列反而退到其次。从商业上来讲，巴纳姆获得了巨额财富，为他日后的政治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1847年林鍼所见到的“博古院”，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混杂了少量自然史标本，所谓各地奇珍异物、马戏杂耍等娱乐活动反而占据主流的场所，故而他才会述及此院“集天下珍奇，任人游玩，楼上悬灯，运用机括，变换可观”。所以与其说“从林鍼‘运用机括’、‘任人

游玩’等语句中可以看出，他此时可能已经模糊地察觉到了美国博物馆的科学性和公共性”^[22]，倒不如说他参观的本来就是一个装备了若干机械装置，以休闲娱乐为中心“任人游玩”的商业场所。这个场所并非以传播科学为目的，吸引公众谋取收入才是巴纳姆的主要目标，以至于被称为是“一个组织混乱的中心，毫无科学性可言，纯粹是低层次的消遣场所”^[23]。所谓“科学性和公共性”大概也是后人对当时美国博物馆的想象，并强加给林鍼的文字而已，如果了解美国博物馆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美国博物馆的“科学性和公共性”恐怕也是后起的历史现象，其博物馆的起源和变迁亦有复杂多元的过程。

值得一提的还有林鍼救助潮州水手的义举，他特别撰写《救回被诱潮人记》，说明自己在纽约遇到被拐骗的26名潮州水手并帮助他们联系“鲁姓”律师的经历。这里的“鲁姓”律师，当为彼时纽约著名律师丹尼尔洛德（W. Daniel Lord）。事实上林鍼还可能隐瞒了自己的基督徒身份和另一位关键人物的作用，那就是近代美国来华著名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24]。林鍼关于营救华人水手的记述或有夸大自身功绩的嫌疑，但他曾游览过纽约城中最大的娱乐中心美国博物馆，并以“博古院”名之，使得他成为目前有史可证最早体验博物馆的中国人。

三、中国最早的博物馆

2012年，葡萄牙学者罗热里奥·米格尔·普加（Rogério Miguel Puga）发表论文称1829年由英国东印度公司三个职员在澳门建立的驻华不列颠博物馆 [British Museum in China (Macao)] 当为中国第一座博物馆，而非1868年成立的上海震旦博物院^[25]。其实早在1836年瑞典人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所著《早期澳门史》中，即提到了这个1829年由英国业余自然史家创建的博物馆^[26]（此书1997年有中译本），故而普加论文的价值仅是利用其余材料证明此馆存在数年，且对英

国自然史研究颇有贡献而已。有论者据此便认定“最新的研究表明，中国最早的博物馆是清道光九年（1829年）创办于澳门的‘驻华不列颠博物馆’”，甚至普加的研究成果可以“终结”“中国最早的博物馆”的争论^[27]，宛如惊世大发现，则未免陈义过高，过于夸大了普加的研究意义，而未能在相应的学术背景中把握其价值。普加作为专治英葡关系、澳门史的学者，近年来致力于澳门英国人早期历史的研究，尤其关注英国东印度公司。他指出东印度公司设立过图书馆、博物馆，所以并非是单纯的商业机构，同时也有文化作用。东印度公司职员的文化和社会活动，充实了澳门的日常生活，增进了亚洲和西方的科学知识^[28]。这明显意在提升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历史地位，试图改变西方学界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既有认识。“中国第一家博物馆”亦仅是由头而已。2014年普加又发表论文称中国第一家英文图书馆也在澳门，1835年伴随东印度公司撤出而消亡^[29]，其逻辑叙述和关于中国第一座博物馆的言说完全一致。那么能否就又可附和说普加的成果改写了中国图书馆史呢？普加在论文中称英国人1840年前后在澳门除建立图书馆、博物馆外，还开设有饭店、学校、医院、报纸、照相馆、出版社、戏剧院^[30]，那么是否据此就要把中国第一家饭店、第一家学校、第一家医院、第一家报社、第一家出版社等全部溯源到澳门？事实上普加笔下的这座驻华不列颠博物馆虽藏有澳门及广东的若干动植物矿物标本和中国艺术品，但其服务对象首先是在澳门的外国人群体，从其人员和知识背景来看，无疑属于英国社会文化传统内的产物，和中国并未有过交集，故其名称首先是British Museum，仅是在中国（In China）而已，况且普加文中一再将“中国”和“澳门”置换，但总是不忘强调Macao作为葡萄牙治理下的飞地（Enclave），提示出历史上“澳门”与“中国”关系的复杂性。

“中国最早的博物馆”本身即是一个不甚严谨的表述，从定义上看，“中国”和“博物馆”都属内涵模糊，外延不明晰且复杂多指的概念。徐坚认为“如果博物馆史的研究价值在于确认当前博物

馆思想遗产的话，执意于从将近一个世纪的学术史回顾都从未言及的黑暗之中打捞绝对年代意义上的更早环节就会变得毫无价值”^[31]，因为谁也不能保证有朝一日是否又会发现新的材料说17、18世纪的澳门曾有荷兰人或葡萄牙人将自己的藏品小范围公开，并称之为“博物馆”，故而执着于年代意义上的“最早”似乎并非必要。至于有论者称普加笔下的驻华不列颠博物馆“至今没有引起内地博物馆学界的重视”，“2013年台湾学者蔡丽娟”引用此文，是“目前中文学界仅见的引用”^[32]。遗憾的是该论者似乎通篇都将台湾学者“戴丽娟”误作“蔡丽娟”，而戴丽娟本人却在论文中表示对“何所博物馆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博物馆”的问题存而不论^[33]。这似乎正反映出学界对“中国第一个博物馆”或“中国最早的博物馆”此类问题是否有价值的态度。执着于年代意义上的“第一”或者“最早”，而全然不顾博物馆本身的藏品、人员、机构与智识脉络，及其与后世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关系，甚至剥离西方研究者立论的学术语境，动辄以“最新研究”的姿态要求中国学术界重视，未免难脱20世纪初学人所批评“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的

殖民地心态，况且“驻华（澳门）不列颠博物馆”仅从名字本身即表露出浓厚的殖民色彩^[34]，这一点是必须注意的。正如追溯中国考古学的诞生虽有1921、1926和1928年三个年份，但共同之处皆是必须有中国人或中国机构主导，且在中国的社会和智识环境下产生，而不是导源于更早的鸟居龙藏、白鸟库吉、斯坦因等人。故而与其胶着“驻华不列颠博物馆”究竟是不是“中国最早的博物馆”这样的主观判断，倒不如转换视角，接踵戴丽娟等学者致力于揭示某个具体博物馆的历史面相和运作方式，这样的研究才具有更大意义。

综上可知，关于中国早期博物馆史研究，作为基础的文献史料尚有丰富内涵可供揭示，而只有在相应语境下对文献史料予以解读，才能尽可能本真还原近代中国人的博物馆观念和实践，从而加深对博物馆事业的理解。对文献史料望文生义地臆测和对域外研究生吞活剥地套用，似乎并不能产生有价值的知识，唯有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中国博物馆史研究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而贯穿于其中的中西知识和人员互动交流的丰富历史图景，亦能由此得以展示。

注释

- [1] 傅振伦：《中国博物馆史略》，《东方杂志》第41卷第15号，1945年8月15日。
- [2] 徐坚：《名山：作为思想史的早期中国博物馆史》，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3页。
- [3] 〔美〕高理文：《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新加坡坚夏书院藏版，道光十八年（1838年），第25页。
- [4] 李飞：《再论汉语“博物院”一词的产生与流传——兼谈E考据的某些问题》，《东南文化》2017年第2期。
- [5] 魏源：《海国图志》第15册卷三十八，《弥利坚即美理哥国总记》上，第一页，道光甲辰（1844年）仲夏古微堂聚珍版。
- [6] 魏源：《海国图志》第16册卷三十九，《弥利坚国东路》，第三页，道光甲辰（1844年）仲夏古微堂聚珍版。
- [7] 魏源：《海国图志》第16册卷三十九，《弥利坚国东路》，第九页，道光甲辰（1844年）仲夏古微堂聚珍版。
- [8] 魏源：《海国图志》第16册卷三十九，《弥利坚国东路二十部 宾西洼尼阿部》，第二十四页，道光甲辰（1844年）仲夏古微堂聚珍版。
- [9] 〔美〕史蒂芬·康恩著，王宇田译：《博物馆与美国的智识生活，1876-1926》，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36页。
- [10] 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序》，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5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6页。
- [11] 傅斯年：《中国学术思想界之根本误谬》，《傅斯年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2页。
- [12] 刘梦溪：《总叙》，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8页。

- [13] 陈建明:《汉语“博物馆”一词的产生与流传》,中国博物馆学会编《回顾与展望:中国博物馆发展百年》,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第213页。
- [14] 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第1册,岳麓书社,2008年,第36页。
- [15] 杨国桢:《我国早期的一篇美国游历记——谈林鍼的〈西海纪游草〉》,《文物》1980年第11期。
- [16] 朱丹丹:《博物馆的初时样貌——〈四洲志〉〈瀛寰志略〉〈西海纪游草〉中的博物馆记述研究》,《中国博物馆》2016年第4期。
- [17] Phineas Taylor Barnum. *The Life of P.T.Barnum*, Sampson Low, Son, & Co.47 Ludgate Hill,1855: 225-226.
- [18] Phineas Taylor Barnum. *The Life of P.T.Barnum*, Sampson Low, Son, & Co.47 Ludgate Hill,1855: 222-223.
- [19] Joel J. Orosz. *Curators and Culture: The Museum Movement in America, 1740-1870*.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90: 132.
- [20] Edward P. Alexander. *Museum Masters: Their Museums and Their Influence*. Altamira Press, 1995: 65-66.
- [21] 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1册,岳麓书社,2008年,第37页。
- [22] 朱丹丹:《博物馆的初时样貌——〈四洲志〉〈瀛寰志略〉〈西海纪游草〉中的博物馆记述研究》,《中国博物馆》2016年第4期。
- [23] 〔美〕休·吉诺韦斯等编,路但俊译:《博物馆起源:早期博物馆史和博物馆理念读本》,译林出版社,2014年7月,第23页。
- [24] 此事详情可参John Rogers Haddad. *The Romance of China: Excursions to China in U.S. Culture, 1776-1876*, chapter 5.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此书现有中文本,何道宽译:《中国传奇:美国人眼中的中国》,花城出版社,2015年,该译本中林金州当为林景周,林鍼字景周。
- [25] Rogério Miguel Puga. *The First Museum in China: The British Museum of Macao (1829-1834)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Natural Scienc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Series 3*, 22, 3-4 (2012): 575-586.
- [26] Andrew Ljungstedt. *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 Boston: James Munroe & Co. 1836: 38; 中文本为吴义雄等译:《早期澳门史》,东方出版社,1997年。
- [27] 李军:《19世纪西人在华博物馆的两种类型——兼论中国最早的博物馆》,《东南文化》2015年第4期。
- [28] Rogério Miguel Puga. *The First Museum in China: The British Museum of Macao (1829-1834)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Natural Scienc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Series 3*, 22, 3-4 (2012): 575-586.
- [29] Rogério Miguel Puga. *The First English Language Library In China: The English Factory Library (Canton-Macao, 1806-1835)*. *Notes & Queries*. Dec2014, Vol. 61 Issue 4: 508-509.
- [30] Rogério Miguel Puga. *The First Museum in China: The British Museum of Macao (1829-1834)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Natural Scienc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Series 3*, 22, 3-4 (2012): 575-586.
- [31] 徐坚:《名山:作为思想史的早期中国博物馆史》,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43页。
- [32] 李军:《19世纪西人在华博物馆的两种类型——兼论中国最早的博物馆》,《东南文化》2015年第4期。
- [33] 戴丽娟:《从徐家汇博物院到震旦博物院——法国耶稣会士在近代中国的自然史研究活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四本第二分,2013年6月。
- [34] 如Robert Bickers在其*Britain in China: Community, culture and colonialism 1900-1949*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中所论。